

# 導論

張凌、李子建

---

本書的上篇以宏觀的視角和嚴謹的分析，展開了一幅香港基礎教育的文化長卷。從城市多元交融的社會背景，到學校各具特色的辦學格局；從凝練如箴言的校訓價值取向，到旋律中流淌的語言選擇與身份認同，上篇系統地梳理並分析了校訓與校歌作為校園文化核心載體的歷史淵源、語言結構與時代印記。我們看到，每一句校訓的選定，每一段校歌的傳唱，都不僅是教育理念的宣示，更是香港這座城市歷史層積、文化互動與價值融合的生動見證。

第一章首先描繪了香港作為東西文化交匯之地的社會圖景與多元辦學格局。從歷史淵源、地區分佈、教學語言、宗教背景，到校園建築、校徽與校服，本章由社會文化背景切入，逐步呈現校園文化具體可感的外在「形體」，為理解作為校園文化「靈魂」的校訓與校歌奠定基礎。

承接這一背景，第二、三章通過廣泛收集並整理全港上千間中小學的資料，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結合質性與量化分析，細緻解讀校訓與校歌的價值取向、語言選擇與時代印記。研究表明，校訓與校歌是理解香港教育多元生態的關鍵符碼——它們承載著辦學團體的初心與使命，反映不同時代的語言政策與文化思潮；既蘊含中西經典的智慧，也體現本土實踐的創造。

然而，文本的靜態分析尚不能完全捕捉這些文化符碼在真實校園中鮮活流淌的生命力。它們如何從牆上的銘文、紙上的歌譜，轉化為師生日常生活

中的行為準則、情感聯繫與集體記憶？又如何在一代代人的傳承中，被賦予新的詮釋與活力？

第四、五章便將視角從宏觀和靜態的數據與文本分析，轉向微觀和動態的校園實踐與生命敘事。我們將跟隨訪談嘉賓的足跡，深入學校的日常場景，觀察校訓如何融入空間設計、課程教學與訓導藝術，了解校歌如何在週年會典禮、運動競賽與校友聚會中激起共鳴，探討它們如何在世代更迭中獲得全新的理解和生命力。在這兩章中，我們主要通過訪談的方法，以研究者的角度進行觀察與分析；而本書的下篇，我們將有幸聆聽來自其中三所學校（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寶覺中學、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在任或榮休校長們的第一手記述。從創校者與辦學者的親身經歷出發，讀者將直接地感受校史、校訓與校歌之間那種血脈相連的溫度與重量。

上篇為我們構建了統觀全港中小學校訓、校歌、校史與文化的框架，下篇將為我們注入感知的溫度。這是一場從「研究其紋理」到「聆聽其心跳」的深化之旅。我們相信，唯有將靜態的符號與動態的實踐相結合，才能真正領略香港校園文化那豐盈而靈動的整體圖景，理解它如何在一代代少年的成長歲月中，刻下深遠而溫暖的文化印記。

是為上篇導論。

# 第一章

## 我們的學校： 香港的多元辦學背景與文化



## 香港：東西文化交匯之地

---

香港，地處中國南疆，珠江口東側，自古以來便是海上絲路的重要樞紐。這座城市獨特的歷史軌跡，塑造出今日融匯東西的多元文化面貌。從南海之濱的小漁村，到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成為英國管治的轉口港，再到 1997 年主權回歸中國、成立特別行政區，香港在一個半世紀的近代化進程中（Carroll, 2007），既吸收了西方外來文化精髓，同時牢牢植根於深厚的嶺南文化傳統之中。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這種「中西合璧」的特質得以延續發展，使香港既保持著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施仲謀、蔡思行，2020），又洋溢著鮮明的國際都會氣息。歷史造就的文化包容性，使香港成為觀察傳統與現代、本地與外來文化互動共生的絕佳之地。

漫步香港街頭，這種東西方文化交融無處不在。中環的百年石板街旁，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與現代摩天大樓比肩而立；銅鑼灣的鬧市中，傳統涼茶舖與星巴克相隔僅數步之遙。清晨，蓮香樓裏老茶客用指尖輕叩桌面表達謝意，延續著廣府飲茶的傳統禮儀；傍晚，蘭桂坊的酒吧裏，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舉杯暢談。這種中西文化並非簡單並存，而是深度交融：茶餐廳裏，「絲襪奶茶」配「肉醬意粉」成為經典組合；辦公室裏，「朝九晚五（早上九點上班，傍晚五點下班）」與「OT（即 overtime，加班）」，粵英夾雜、自然切換的溝通方式已成為本地特色。

在人口與社會結構方面，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統計處的數據<sup>1</sup>，截至 2025 年中，香港人口約為七百五十多萬，其中九成以上為華裔（種族屬以漢族為主的華人<sup>2</sup>）（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大部分祖籍源自珠江三角洲地區。以華裔為主體的社會結構，自然傳承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基因，民間信仰中的祖先崇拜與地方神祇供奉依然興盛。值得注意的是，華裔人士通常不會正式申報宗教信仰，故統計中「無宗教信仰」類別佔相當比例。與此同時，作為開放的國際都會，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錫克教等世界性宗教也在此落地生根，各有發展。

不同宗教場所並立於香港的都市空間，信徒之間彼此尊重，形成了以實用與包容為特色的宗教文化生態（Bosco, 2015）。黃大仙祠終日香火鼎盛，求籤問卜的善信絡繹不絕；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每週都有參加彌撒的信眾虔誠祈禱；尖沙咀的九龍清真寺、跑馬地的印度廟，各自守護著不同信仰的族群。這種宗教包容性更體現在生活細節中：不少家庭既在清明重陽祭祖掃墓，也歡度聖誕；商舖門前供奉著關帝、土地公神位，也掛上聖誕花環，展現出實用與包容並存的宗教文化特色。

語言生態方面，粵語作為最具活力的本土語言，不僅是九成市民的日常用語，更是流行文化的重要載體，從經典的粵語金曲（黃湛森，2003）到地道的港產片對白，都承載著集體的情感記憶。與此同時，英語在司法、金融、商業等領域的持續影響力，與普通話在跨境交流中的日益重要，共同構築了「兩文三語」的語言格局，官方正式推動這項語言教育政策，更是強化了香港的多語環境。

在實際教育場景中，這種語言政策生動呈現：小學生在中文課上用粵語朗誦古典詩詞，英文課上通過戲劇活動學習莎士比亞，普通話課上說故事、

1 數據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tc/scode150.html>，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2 數據網址：[https://www.had.gov.hk/rru/tc\\_chi/info/demographics.htm](https://www.had.gov.hk/rru/tc_chi/info/demographics.htm)，檢索日期：2026 年 2 月 10 日。

學成語。中學文憑試（DSE）要求學生同時掌握中英文寫作能力，而大學校園裏，粵語、英語、普通話的交替使用更是常態。這種多語能力使香港新一代既能欣賞傳統的粵劇藝術，也能參與內地和國際學術討論，真正實現了「立足本地，連接世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各校在實踐「兩文三語」政策時各具特色：有些小學在低年級採用粵語授課，逐步過渡到高年級用普通話教中文，用英語教科學和數學等科；有些國際學校更提供法語、德語等第三語言選擇。這種語言教育的多樣性，使得香港學生能夠根據自身需求，培養真正的多語能力。

香港是非常重視教育的大都市。政府統計處的數據<sup>1</sup>顯示，25至44歲港人中具備中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達98.1%，15至24歲群體更達到99.8%。這些數字背後，是自1970年代開始推行的義務教育政策，以及2017年起實施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制度的成果：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65歲以上具備中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佔比只有52.9%。

如今，香港已建立起涵蓋幼稚園至高中的完整教育體系，為基礎教育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中，幼稚園教育（2至6歲進行）一般定性為學前教育，而小學教育和中學教育則為正式的基礎教育階段。截至2025年中<sup>2</sup>，6歲至18歲人口為71.6萬，佔人口比例的9.4%。本書聚焦在中小學，也就是基礎教育階段，正是因為這是青少年形成人生觀和世界觀的關鍵時期。透過研究中、小學的校訓和校歌，我們得以探討校園文化如何在這個重要階段，為學生的價值觀培養帶來深遠影響。

---

1 數據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10-06813](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10-06813)，檢索日期：2025年9月30日。

2 數據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10-01001](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10-01001)，檢索日期：2025年9月30日。

## 我們的學校：多元辦學背景

---

在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資助下，本書研究團隊近年來開展了名為《年少如歌——香港中小學校歌、校訓與校史研究》的研究項目（編號 CSTB/C 27/9/193）。項目從全港各中小學的官方網站收集資料，輔以 Schooland 網站（<https://www.schooland.hk/>）的補充資料，一共收集到 548 間小學和 477 間中學的學校資訊及校訓和校歌等資料，在下文圖表的數據來源說明中，皆稱為「本研究項目之資料集」。若對此資料集有疑問，歡迎與本書第一作者張凌博士聯絡（[zhangl@eduhk.hk](mailto:zhangl@eduhk.hk)）。在這一節中，我們統觀這一千多間中小學的數據，了解香港多元辦學背景。

### （一）資助類別

首先，香港有多元靈活的辦學體系，從資助類別來說主要有官立、津貼（資助）、直資和私立四大類別。官立學校由香港政府直接開辦，政府負責全部經費，一般校名都有「官立」二字。津貼學校也稱資助學校，一般由非政府辦學團體經營和管理，但受政府資助，大部分辦學經費來自政府補貼，也需遵循政府的規定。官立學校和津貼學校的學費皆全免。直資學校全稱為「直接資助計劃學校（Direct Subsidy Scheme School）」，由非政府辦學團體經營，相比於資助學校，直資學校有相對高的自主權，可自訂課程及入學要求，不少直資學校提供融合本地與國際課程的創新教育，可收取學費，但同

時可得到政府部分資助（金額按照合資格學生人數提供），學費通常較私立學校為低。私立學校由非政府辦學團體全數自資運營，沒有政府資助，自負盈虧，收取學費，可提供非本地課程，如國際文憑課程。

表 1.1 香港各地區官立、資助、直資和私立學校數目分佈

|                               | 地區 | 小學  | 中學  |
|-------------------------------|----|-----|-----|
| <b>官立</b><br>小學：35<br>中學：31   | 港島 | 11  | 8   |
|                               | 九龍 | 14  | 8   |
|                               | 新界 | 10  | 14  |
|                               | 離島 | 0   | 1   |
| <b>津貼</b><br>小學：426<br>中學：363 | 港島 | 55  | 56  |
|                               | 九龍 | 121 | 103 |
|                               | 新界 | 234 | 198 |
|                               | 離島 | 16  | 6   |
| <b>直資</b><br>小學：21<br>中學：60   | 港島 | 4   | 11  |
|                               | 九龍 | 7   | 25  |
|                               | 新界 | 10  | 21  |
|                               | 離島 | 0   | 3   |
| <b>私立</b><br>小學：66<br>中學：23   | 港島 | 18  | 6   |
|                               | 九龍 | 32  | 12  |
|                               | 新界 | 14  | 4   |
|                               | 離島 | 2   | 1   |

（表 1.1 數據來源：本研究項目之資料集。）

表 1.1 列出香港各地區（港島、九龍、新界）官立、津貼、直資和私立學校數目分佈。從整體數量來看，津貼學校在香港基礎教育體系中佔據核心地位。全港共有 426 間津貼小學，佔小學總數的 77.7%；363 間津貼中學，佔中學總數的 76.1%。這顯示香港的基礎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資助、由宗教團

體和慈善機構管理的辦學模式。

從地區分佈來看，九龍和新界這兩個區域的學校數量最為集中，特別是津貼學校，九龍有 121 間小學和 103 間中學，新界更有 234 間小學和 198 間中學。這與其人口密度和居住分佈相符。港島作為傳統核心區域，學校類型較為多元，私立小學（18 間）和直資中學（11 間）相對較多，反映其社會經濟特點。離島的教育資源相對薄弱，主要以津貼學校為主（16 間小學、6 間中學），其他類型的學校較少。

從辦學類型的區域性特徵來看，直資學校中學階段（60 間）明顯多於小學階段（21 間），且在九龍的分佈最為密集（25 間中學），顯示直資模式在中學教育中更受青睞。而私立學校之中的小學（66 間）遠多於中學（23 間），特別是在九龍（32 間私立小學）和港島（18 間私立小學），反映家長在基礎教育階段對多元化選擇的需求。官立學校在各區分佈相對均衡，但在離島僅有一間官立中學，顯示政府辦學資源的配置考量。

以上辦學分佈格局體現了香港基礎教育「政府主導、多元參與」的鮮明特色。以津貼學校為主體，保障基礎教育的普及性和公平性；同時通過直資和私立學校提供多樣化的選擇，滿足不同家庭的需求。特別是在中學階段，直資學校的發展為教育多元化提供了重要補充，而各地區不同的學校類型組合，也反映了當區的社會經濟特徵和教育需求。這種多元化的辦學格局，為香港學生提供了豐富的教育選擇，同時也為研究不同學校類型的文化特色提供了有價值的數據基礎。

## (二) 地區分佈

表 1.2 香港十八區的中小學分佈

| 區域 |     | 小學 | 中學 | 區域 |     | 小學 | 中學 |
|----|-----|----|----|----|-----|----|----|
| 港島 | 中西區 | 22 | 12 | 新界 | 葵青區 | 33 | 31 |
|    | 灣仔區 | 20 | 18 |    | 荃灣區 | 22 | 13 |
|    | 東區  | 29 | 31 |    | 屯門區 | 36 | 38 |
|    | 南區  | 17 | 18 |    | 元朗區 | 53 | 39 |
| 九龍 | 油尖旺 | 23 | 20 |    | 北區  | 31 | 20 |
|    | 深水埗 | 34 | 29 |    | 大埔區 | 22 | 23 |
|    | 九龍城 | 49 | 37 |    | 沙田區 | 43 | 46 |
|    | 黃大仙 | 31 | 25 |    | 西貢區 | 30 | 27 |
|    | 觀塘區 | 35 | 38 |    | 離島區 | 18 | 12 |

(表 1.2 數據來源：本研究項目之資料集。)

表 1.2 列出香港十八個區議會分區中小學更詳細的分佈，從中可見有以下幾個清晰的層次與特點：首先，傳統核心區域學校分佈密集而且平均，港島的東區（小學 29 間，中學 31 間）和九龍的深水埗區（小學 34 間，中學 29 間）是典型的代表。這兩區不僅中小學數量眾多，而且中學與小學的數量相近，顯示出教育資源配置完備，能為區內學生提供從基礎到進階的完整教育體系，這可能與其長期以來皆為人口密集的成熟社區有關。第二，新市鎮區域需求龐大，資源集中，新界的多個分區都體現了這一特點，尤以元朗區（小學 53 間，中學 39 間）和沙田區（小學 43 間，中學 46 間）最為顯著。這些區域小學數量極高，反映其龐大的學齡人口。第三，都會老區與新興社區呈現結構性差異：屯門區（小學 36 間，中學 38 間）和觀塘區（小學 35 間，中學 38 間）是少數中學數量略超小學的分區，顯示其作為區域教育中心的角色，吸引了周邊地區的學生。而離島區（小學 18 間，中學 12

間)的學校總量遠低於其他區域，資源相對有限，顯示出地理條件對教育資源分配的限制。整體而言，香港的學校分佈格局反映了其人口結構與城市發展歷程。九龍（李子建、劉瑩、陳智德、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2021）及港島部分老牌社區（黃棣才、劉亮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2020；李子建等，2023）資源穩定均衡；而新界各新市鎮（李子建等，2022）則承載了最主要的學齡人口壓力，數量龐大但資源相對緊張。這種不均衡的分佈，為理解不同地區學校所面臨的挑戰、承載的社會功能及其可能形成的獨特校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空間背景。

### （三）教學語言

根據 Schooland<sup>1</sup> 網站上所列香港各中小學主要教學語言的情況，我們可觀察到香港作為雙語社會，其教育體系在實踐中所呈現出的階段性差異，反映了對中英雙語的不同側重與平衡方式。

在小學階段，教學語言呈現「中文為主、雙語並行」的格局。絕大多數學校以中文作為主要教學語言，體現對母語教學理念的堅持；同時，有很多學校採取中英並重的教學方式；僅 56 間學校主要使用英語教學，數量相對較少。

進入中學階段，教學語言格局轉向「中英分流、英語提升」的模式。此階段已不見「中英並重」的學校，學生需根據學校定位與資源，分流至以英語或中文為主的教學環境。值得注意的是，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中學數量達 192 間，遠超過小學階段的 56 間，約佔全港中學的四成。這一現象背後有著多重因素：過去教育政策長期鼓勵中學發展為「英文中學」，其影響延續至今；同時，提供英語教學常被視為學校實力與國際化程度的標誌，有助於吸引優秀學生；此外，許多家長認為英語教學能為子女開拓更廣闊的升

<sup>1</sup> <https://www.schooland.hk/>，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5 日。

學途徑與職業前景。

儘管英語教學在中學階段佔有重要地位，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仍在數量上保持主體地位，共 284 間，約佔總數的六成。這確保了大多數學生能夠在最熟悉的語言環境中掌握學科知識，並有助於本土文化的傳承。

總體而言，香港教學語言格局呈現出從小學「雙語並重」到中學「中英分流」的發展路徑。這種語言分佈與過渡機制，不僅對學生的語言能力培養產生深遠影響，更牽動其文化認同建構與未來發展機會，成為理解香港多元校園文化的一個關鍵視角。

另一方面，學校的主要教學語言往往會影響其對校訓和校歌語言的選擇。例如，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可能更傾向於採用英文校訓和英文校歌。然而，這並非絕對規律，實際情況中存在不少例外（如協恩中學雖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其校歌僅有粵語版本）。在本書下文針對校訓與校歌的語言分析中，我們將依據所取得的實質數據進行深入探討。

#### （四）性別類型

表 1.3 香港中小學性別類型分佈

| 性別類型 | 小學  | 中學  |
|------|-----|-----|
| 男女校  | 521 | 410 |
| 男校   | 10  | 26  |
| 女校   | 17  | 41  |

（表 1.3 數據來源：本研究項目之資料集。）

根據表 1.3 的數據，香港中小學在性別類型上，呈現出「混合教育為主體、單性別教育在中學階段顯著發展」的總體格局。絕大多數學校實行男女混合教育，小學階段的男女校多達 521 間，佔比高達 95.1%；中學階段的男女校亦有 410 間，佔比為 86.0%，這顯示混合教育是香港基礎教育的主流

模式。

從小學到中學，單性別學校的數量與比例呈現明顯的增長趨勢。小學階段，男校僅有 10 間，女校為 17 間，合計不足總數的 5%；但到了中學階段，男校增至 26 間，女校更大幅增加至 41 間，合計佔中學總數的 14.1%。這一轉變顯示，香港教育體系在基礎教育階段後，為家長和學生提供了更多單性別教育的選擇。許多歷史悠久、具有深厚辦學傳統與聲譽的學校皆為單性別學校，它們往往形成了獨特的校風與教學特色，並在長期辦學中積累了深厚的社會認同。

這種分佈格局反映了香港社會在教育選擇上的多元價值觀：一方面，主流體系擁抱男女合校，促進兩性間的正常交往與共同成長；另一方面，單性別教育，特別是中學階段的單性別學校，作為一種重要的替代模式，長久以來持續存在並發揮影響，滿足了部分家庭對特定教育環境的偏好。這種並存現象豐富了香港的教育生態。

與此相應，校歌的歌詞常直接體現出學校的性別屬性。這種體現最直觀的方式，便是使用帶有性別指向的集體稱謂。例如，喇沙書院、英皇書院、聖若瑟英文中學等多所男校的校歌中，均反覆出現「boys」一詞；而聖保羅書院、皇仁書院等校歌則常用「brothers」一詞，強調兄弟情誼。另一方面，嘉諾撒聖瑪利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聖保祿學校等女校的校歌中，則常見「girls」或「daughters」的稱呼；嘉諾撒聖家學校、嘉諾撒聖家書院等校的校歌則選用「sisters」一詞，以突顯姊妹情誼。這些特定的稱謂詞彙，不僅標示了學校的生理性別類型，更在情感與文化層面，強化了單性別教育環境所營造的獨特同儕關係與團體精神。

## （五）宗教背景

根據表 1.4 的數據，香港中小學的宗教背景分佈呈現出「以基督信仰與無宗教為主體，多元宗教並存」的鮮明格局。單以宗教背景而言，無宗教背

景的學校為數最多，小學達 222 間，中學有 203 間，顯示世俗教育在香港基礎教育中佔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具有宗教背景的學校，特別是基督宗教學校，則構成了香港教育體系中的重要部分。

表 1.4 香港中小學的宗教背景分佈

| 宗教背景 | 小學  | 中學  |
|------|-----|-----|
| 無宗教  | 222 | 203 |
| 天主教  | 111 | 88  |
| 基督教  | 184 | 152 |
| 佛教   | 15  | 21  |
| 道教   | 9   | 6   |
| 儒釋道  | 4   | 5   |
| 孔教   | 1   | 1   |
| 回教   | 2   | 1   |

（表 1.4 數據來源：本研究項目之資料集。）

具體而言，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與基督教）背景的學校在宗教類別中佔據主導地位。基督教背景的小學有 184 間，中學有 152 間；天主教背景的小學亦有 111 間，中學 88 間。兩者合計，基督宗教學校在小學階段佔比超過五成，在中學階段也接近半數，這反映出基督宗教在香港教育發展上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並通過其龐大的學校網絡，持續影響著香港的教育理念與校園文化。

此外，表 1.4 也顯示了香港社會的宗教多元性。佛教（小學 15 間、中學 21 間）、道教（小學 9 間、中學 6 間）等傳統中國宗教皆有辦學實踐。較為特別的是一些融合性的宗教背景，如「儒釋道」合一的學校（小學 4 間、中學 5 間）以及孔教學校（中小學各 1 間），它們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教育中的傳承與創新。回教背景的學校數量雖少（小學 2 間、中學 1 間），但也為特定族群提供了教育選擇，豐富了香港的教育圖景。

這種多元宗教背景的辦學格局，是香港教育多元化的直接體現。不同宗教背景的學校往往承載著各自獨特的教育哲學、價值理念（李子建，2023）與校園文化，它們共同構建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教育生態系統，為家長和學生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也使得宗教背景成為理解和研究香港學校文化的一個關鍵維度。不同宗教背景的學校，其校訓和校歌在用詞與表達上亦呈現出不同的傾向，後文將對此進行具體分析。

### （六）辦學團體

在不同的宗教背景之下，辦學主體還可更細分為不同的辦學團體。而本研究項目所統計的 1025 間中小學，一共由 304 個不同的辦學團體來營運。

表 1.5 香港辦校數目較多的團體

| 辦學團體       | 宗教背景 | 小學 | 中學 |
|------------|------|----|----|
| 香港聖公會      | 基督教  | 60 | 32 |
| 天主教香港教區    | 天主教  | 56 | 26 |
| 香港特區政府     | 無宗教  | 34 | 31 |
|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基督教  | 23 | 26 |
| 保良局        | 無宗教  | 25 | 18 |
| 東華三院       | 無宗教  | 14 | 18 |
|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 基督教  | 11 | 8  |
| 香港佛教聯合會    | 佛教   | 7  | 12 |
|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 天主教  | 11 | 6  |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 基督教  | 8  | 4  |
| 鮑思高慈幼會     | 天主教  | 6  | 6  |
| 九龍樂善堂      | 無宗教  | 6  | 6  |
| 耶穌寶血女修會    | 天主教  | 8  | 3  |

| 辦學團體          | 宗教背景 | 小學 | 中學 |
|---------------|------|----|----|
|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 基督教  | 7  | 4  |
| 仁濟醫院          | 無宗教  | 5  | 6  |
| 順德聯誼總會        | 無宗教  | 5  | 6  |
| 香港浸信會聯會       | 基督教  | 6  | 4  |
| 香港道教聯合會       | 道教   | 5  | 5  |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 基督教  | 4  | 6  |
| 嗇色園           | 儒釋道  | 4  | 5  |
| 香港明愛          | 天主教  | 0  | 9  |
| 博愛醫院          | 無宗教  | 4  | 4  |
| 喇沙修士會         | 天主教  | 3  | 5  |
| 基督教興學會        | 基督教  | 2  | 6  |
| 香海正覺蓮社        | 佛教   | 4  | 3  |
| 地利亞教育機構       | 無宗教  | 2  | 5  |

（表 1.5 數據來源：本研究項目之資料集。）

在這些辦學團體中，有些擁有較多的學校，表 1.5 列出辦校數目較多的團體，從中我們可以歸納出香港主要辦學團體的幾個重要特徵：

首先，香港聖公會與天主教香港教區無疑是香港兩個最主要的辦學力量。聖公會旗下擁有 60 間小學和 32 間中學，天主教香港教區則辦有 56 間小學和 26 間中學，兩者合共營運接近 200 間中小學。此外，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等基督教團體也擁有相當規模的學校網絡。這顯示基督宗教團體在香港教育發展史上扮演了無可替代的角色，透過長期辦學深刻影響了香港的教育發展。

第二，香港特區政府直接營運 34 間小學和 31 間中學，是官立學校體系的核心。同時，以保良局（25 間小學、18 間中學）和東華三院（14 間小學、18 間中學）為代表的傳統慈善機構，以及九龍樂善堂、仁濟醫院等慈

善組織，共同構建了強大的世俗辦學體系。這些團體源自香港本土的慈善傳統，其辦學實踐體現了服務社會、扶助弱勢的民間精神。

第三，除了基督教和天主教之外，其他宗教團體也在教育領域各有建樹。香港佛教聯合會辦有 7 間小學和 12 間中學，香港道教聯合會擁有中小學各 5 間，齋色園作為儒釋道融合的代表，辦有 4 間小學和 5 間中學。這種多元宗教參與辦學的現象，反映了香港社會的宗教包容性，也為家長提供了更多元的教育選擇。

第四，多數辦學團體同時經營中小學，形成連貫的教育體系，如聖公會、天主教教區、保良局等。然而也有部分團體呈現獨特的分佈模式，如天主教香港明愛沒有辦小學，但卻辦了 9 間中學，基督教興學會僅辦有 2 間小學卻擁有 6 間中學，香港佛教聯合會的中學數量（12 間）也多於小學（7 間），顯示不同團體各有其辦學重心與發展策略。有些辦學團體經營的中小學採用「一條龍」的辦學模式<sup>1</sup>，即「龍」內的小學和中學緊密合作，小學生可以直升其中學，毋須煩惱升中問題。這些「一條龍」中小學，有的採用同一校名，統一管理，如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有些在名稱上則有中學和小學的區分，如拔萃女書院和拔萃女小學；還有些校名不同，但屬於同一辦學團體，如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和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sup>2</sup>。這些「一條龍」學校，多數採用相同的校訓和校歌，有助於強化十二年一貫制的共通校園精神和文化。

總體而言，多元主體共同辦學的模式，構成了香港教育制度的獨特生態。各辦學團體將其核心價值與辦學理念融入學校管理與文化建設中，使香港的學校展現出豐富多彩的面貌，也為研究校園文化提供了豐富的觀察樣本。從聖公會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到佛教團體的「明智顯悲」，從政

---

1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through-train/faq-parent.html>，檢索日期：2026 年 3 月 5 日。

2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through-train/sch-list.html>，檢索日期：2026 年 3 月 5 日。

府學校的規範統一至慈善機構的服務精神，每間學校都在這種多元格局中找尋自身的定位與特色。

## （七）建校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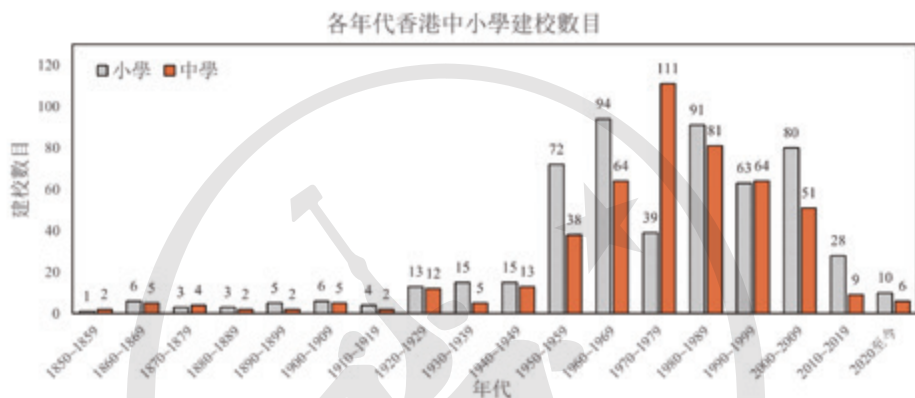


圖 1.1 各年代香港中小學建校數目趨勢

（圖 1.1 數據來源：本研究項目之資料集。）

從建校歷史來看，香港各校的創校年份跨度極大，見證了這座城市教育發展的漫長歷程。香港現存學校中，歷史最悠久的中學是在 1818 年創建於馬六甲，1843 年遷至香港的英華書院，而最早的小學則是 1851 年成立的聖保羅書院小學；與此相對，最新成立的聖道百卉書院（中學）與安菲爾聖鮑思高冠英學校（小學）皆於 2024 年創校，建校年份橫跨兩個世紀，充分體現香港學校在時間維度上的歷史縱深。

十九世紀中葉之前，香港教育主要延續傳統私塾模式，現代型式的學校體系尚未形成。直至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才開始有零星現代學校成立，而真正的擴張期要到 1950 年代才正式展開（貝磊、古鼎儀著，賈文浩、賈文淵譯，2002；操太聖，1997；邱小金、梁潔玲、鄒兆麟、香港歷史博物館，1993；顏明仁，2010）。根據圖 1.1 顯示，香港中小學在不同年代的建校數量呈現清晰的發展軌跡，深刻反映出社會變遷與教育政策的互動

關係。

1950 至 1969 年間，小學建設數量顯著領先中學，其中 1950 至 1959 年小學建校 72 間，中學僅 38 間；1960 至 1969 年小學建校 94 間，中學為 64 間。這一格局與戰後嬰兒潮及內地移民湧入密切相關，顯示當時教育政策優先解決學童激增對基礎教育的需求。中學資源相對有限，反映當時香港尚未普及中等教育，多數青少年完成小學後即進入勞動市場。

1970 年代起，中學建設速度明顯加快。1970 至 1979 年間，中學建校數量達 111 間，遠超小學的 39 間，這一轉變與政府於 1978 年實施的「九年免費教育」政策直接相關。1980–1989 年間，中學建校 81 間，小學為 91 間，兩者趨於平衡；到 1990 至 1999 年間，中學建校 64 間，小學為 63 間，顯示香港教育重心已從「普及基礎教育」全面轉向「發展中等教育」，教育體系日趨完整。

2000 至 2009 年間，小學又有新的增長，建校 80 間，這可能與新的人口增長有關；中學則減緩增長，只有 51 間。2010 年後，建校規模開始明顯收縮。2010 至 2019 年進一步減少至小學 28 間、中學 9 間；2020 年後更降至小學 10 間，中學 6 間。這種銳減現象主要源於三方面因素：出生率持續下降導致學童人口減少、都會區土地資源飽和限制新建學校空間，以及教育政策轉向整合與優化現有資源。

總體而言，香港建校數量的變化，清晰勾勒出教育發展從「解決就學機會」到「提升教育質量」，再到「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的三階段歷程。這種建校格局不僅體現教育政策對社會需求的回應，也預示著未來香港教育將更著重於資源整合與質量提升。

在綜觀全港中小學建校歷史時，尚有以下三點需要補充說明：

第一，關於資料來源。香港許多學校均注重自身歷史文化的整理與展示，並將相關資料公開於官方網站。本書的研究資料搜集亦得益於此，從各校官網中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資訊。研究中所引用的具體資料，將於註釋中標明其官方網址出處。

第二，關於建校年份的界定。在研究收集的建校年份中，部分學校標注的實為其最早源頭的創立時間，而非在香港本地建校的年份。例如，真光體系學校（如九龍真光中學<sup>1</sup>、香港真光中學<sup>2</sup>等）將建校年份追溯至 1872 年，即美國傳教士那夏理女士（Harriet Newell Noyes）在廣州創辦第一所真光學校之年，而其在香港落地辦學則始於 1935 年。類似情況亦見於培正<sup>3</sup>（1889 年於廣州創校，1933 年在港設分校）、培道<sup>4</sup>（1888 年於廣州創校，1938 年遷港）、培英（1879 年於廣州創校，1937 年在港設分校）等校。當年廣州學界流傳著「真光豬、嶺南牛、培正馬騮頭、培道女子溫柔柔」的有趣順口溜，生動印證了這些學校深厚的廣州淵源，其文化血脈在香港亦得以傳承。這些學校的歷史，反映了香港早期教育與基督教傳播、廣府文化及戰時南遷潮流的緊密關聯，亦體現了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同根同源、同氣連枝的特色。

第三，關於校訓、校歌與建校時間的關係。學校的建校年份、校訓確立與校歌創作時間未必完全同步。校訓與校歌往往是學校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與確立的文化產物。例如，真光學校的校歌歌詞出現「政成共和，民歌大同」，可推斷其創作於辛亥革命（1911 年）之後；而根據一位 1926 年入學的校友回憶，當時已能傳唱校歌，故其創作時間應介乎 1911 年至 1926 年之間（九龍真光中學，2018）。這正好說明校訓與校歌很多時候是在學校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確立的。

儘管存在上述時間層面的複雜性，本研究仍將建校年份作為一項重要的背景參數，旨在通過大樣本的量化分析，宏觀觀察校訓、校歌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共生關係。在此過程中，我們亦充分認識到具體個案中可能存在資料誤差，並將在分析時考慮這點。

---

1 <https://www.ktls.edu.hk/zh/about-zh/history/>，檢索日期：2026 年 1 月 26 日。

2 <https://ec2-13-213-205-198.ap-southeast-1.compute.amazonaws.com/about-tl/school-history/>，檢索日期：2026 年 1 月 26 日。

3 <https://puiching.ctcampus.com/tc/%E6%9C%AC%E6%A0%A1%E6%AD%B7%E5%8F%B2>，檢索日期：2026 年 1 月 26 日。

4 <https://www.pooito.edu.hk/tc/history>，檢索日期：2026 年 1 月 26 日。

# 導讀

張凌、李子建

---

教育，從來不只是一門知識的傳授，更是一種精神的浸潤、一種文化的傳承。在香港這片多元交融的土地上，每一所學校都是一座獨特的精神燈塔，其校訓、校歌、校史與校園文化，共同編織成一代代學子難忘的年少記憶與人格底色。

本書下篇「香港中小學校歌、校訓大家談」，匯聚了十二篇來自不同學校背景的教育工作者、學者與校友的真摯分享。他們之中，有現任校長、榮休校長、教授、博士，亦有文化研究者，雖身份各異，卻同樣懷著對母校的深情、對教育的熱忱，提筆回溯那些鐫刻於心的校訓箴言、迴盪於歲月的校歌旋律，以及校園中那些溫暖而堅毅的成長故事。

我們於下篇邀請了不少現任及榮休校長撰寫文章，期望透過他們的親身經歷與內部視角，呈現各校精神的傳承與實踐。然而，這種取徑在學術研究上亦有其局限：首先是所述內容難免帶有個人回憶的色彩與主觀詮釋的印記；其次是囿於篇幅與研究項目時間限制，未能涵蓋所有學校類型與歷史階段，故事的代表性因而受限。讀者或可將這些篇章視為一系列深度的個案透鏡，從中窺見香港學校教育豐富面貌的一隅，而非全貌。有感於上述種種局限，我們為讀者提供了以下一些分析與討論，以作參考。

各位嘉賓的文章，如同十二扇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香港學校教育豐富而深厚的面貌：

施仲謀教授的宏觀研究為本書的課題提供了堅實的學術背景。他通過對全港逾千所學校校訓的分析，指出「禮義教化」是香港校訓文化中最為突出的共同主題與價值觀。研究揭示，這些校訓雖源自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及民間團體等不同背景，但其表述形式卻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多採用文言或對仗句式，體現了深刻的中西交融特質。更為關鍵的是，研究數據表明，超過半數校訓的思想核心直接或間接源於儒家經典，呈現出「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鮮明文化圖景。該研究不僅梳理了校訓在「為學、修身、濟世」三大維度的呈現，更以「真光」、「培正」等校訓的百年流轉為例，闡釋了校訓作為辦學精神載體所承擔的歷史傳承功能，從學理上深刻印證了香港教育扎根於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

陳家偉校長以其跨越多校的獨特經歷現身說法，展現了校訓校歌如何在一個人生命的不同階段持續「陶鑄靈魂」。他回顧了自己作為學生與教育工作者的雙重軌跡：從石蔭慈幼小學「敬天主，愛父母」的鮑思高精神，到東華三院「勤、儉、忠、信」的校訓與「服務社會」的召喚；從在優才書院踐行「自愛自知自發自強」的資優教育理念，到執掌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後，進一步深化「省德立人」與「忠孝勤誠」的儒家修身傳統。通過對這四所背景各異學校的校訓與校歌作出細膩比較與共鳴分析，他真摯地揭示，這些精神養分不僅塑造了他個人的品格與志向，更成為其教育生涯中一以貫之的價值基石，最終匯聚成一份超越校園、終身踐行的社會服務承諾。

瑪利諾修院學校的陳家卓校長（小學部）與陳倩君校長（中學部）合撰的文章，引領我們走進紅磚校園的百年樂韻之中。她們以「明德惟馨（Sola Nobilitas Virtus）」的校訓為綱，細膩剖析校歌如何將源自瑞士作曲家 Ernest Bloch 《America: An Epic Rhapsody》的旋律，轉化為對真理、仁愛與生命價值的追尋。文章不僅解讀了莊重內斂的音樂語言如何表達信念的建立與價值的延續，更回溯了 1920 年代修女們作為「巾幗先驅」，以音樂與教育為華人少女推開文明之窗的歷史。校歌中「To home, to country, to the world」一句，層層遞進，勾勒出從個人內在品格奠基，到履行對家國乃至世界責任的

清晰軌跡，體現了瑪利諾教育中超越時代的女性啟蒙與靈性培育傳統。

梁綺華校長作為九龍塘學校的校友與掌門人，以真摯的筆觸回溯學校九十載的人文積澱。她從「勤、慎、禮、儉」的校訓，講到「九龍山勢巍昂」的校歌，再溯源至「春江堂」、「廷錯堂」的建校往事，將學校精神深深植根於社區網絡、家國情懷與綠色人文的土壤之中。她尤其強調了校歌以文言文創作、堅持國語傳唱所承載的文化自覺。文章更將綠色四合院式校舍建築、融合「九」「龍」「塘」意象的校徽設計與「明日領袖」的育人目標相貫通，清晰地展現了一所歷史名校是如何將社區情懷、家國記憶、人文底蘊與生態意識，深深植入每一代學子的成長過程之中的。

陳淑雯校長帶我們走進寶覺中學的歷史長廊，從一首校歌、一襲藍衫的故事中，讓「慈悲博愛」的佛教情懷變得可觸可感。她在文中回溯了1930年張蓮覺居士為貧苦女童創辦義學的初心，揭示了「女子為國民之母」的遠見以及學校如何將「利己利人尚力行」的佛法精神融入辦學理念。文章不僅呈現了學校從女子義學到職業中學、再到男女同校的演進脈絡，更透過「寶覺服裝社」的創辦、旱災時期全校改換藍色校服的動人往事，生動地展示了校訓如何在課程設計、學生關懷與社會適應中具體踐行。這些溫暖人心的歷史細節與校友記憶，勾勒出一所佛教學校如何將「慈悲博愛」從理念轉化為滋養學子的生命底色，並在時代變遷中始終堅守「改造社會度人群」的育人使命。

賴俊榮校長則為讀者系統地闡釋了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明道立德」校訓的深邃哲思。他從「道」作為宇宙本源與法則的高度出發，將道家「道法自然」、「尊道貴生」的核心智慧，與現代「生命教育」無縫銜接。文章不僅深入解讀「以道為宗、以德為化、以修為教、以仁為育」的辦學宗旨，更展示了校訓如何從認識天地規律（明道），具體落實為孝、悌、忠、信等「八德」善行的日常實踐（立德）。學校通過校本「道化教育」課程、「生命孩子」關懷計劃等途徑，致力培養學生認識自我、掌管生命，最終達致「自主生命」的積極人生觀。校歌中「敬教匡時勸學」、「八德倫常恪守」

的箴言，則進一步將這套融合傳統道家智慧與當代育人目標的教育理念，凝練成可誦可傳的集體信念。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榮休校長劉筱玲博士講述了如何將慈善傳統轉化為教育創新的歷程。她詳細闡釋了學校如何以「愛、敬、勤、誠」為基石，勇敢衝破應試文化的桎梏，推行沒有分數排名、鼓勵開放式思考的教學模式。文章生動展現了學校一條龍雙語教育體系的構建，從中小學雙班主任制到融合 IGCSE 與 IB 的課程設計，並透過「世界教室」與社區服務，將學習場景延伸至全球範圍與社會實踐之中。學校更將校訓具象化為「愛、敬、勤、誠」四大學社，分別以鳳凰、獅子、狼、鷹為象徵，並將這一設置融入團隊活動與精神傳承之中。這一切，都讓保良局「保赤安良」的百年慈善精神，在現代教育的土壤中重新激活，培育出兼具國際視野、關懷精神與創新能力的未來人才。

朱子穎校長從創校者的視角，深刻闡述了德萃學校如何在短短十年間，有意識地構建一套融合傳統與創新的教育體系。學校緊扣中文校訓「德以為本，學以精萃」的理念，將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系統性融入一條龍國際課程架構之中，實現品德修養與學術卓越的並行發展。文章細緻描繪了從香港六所校舍到大灣區延伸的辦學佈局，展現了「一校多點、互為支持」的協作網絡。統一的英文校歌，其旋律與歌詞共同承載著學校精神，成為連接各校各學段學生的情感紐帶。

伍德基校長的記述，道出如何將深厚的教育傳統創造性轉化為靈活可用的當代育人體系。他以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為例，生動闡釋了「博文約禮」這一源自《論語》的古老校訓，如何通過全校師生的共同參與，演繹為關愛、團結、和諧、勤學、慎思、溝通、自律、解難這八項具體可觀、可實踐的核心價值。這套體系巧妙地將各項價值的英文首字母凝結為「CUHK」與「TCSS」，既標誌著與香港中文大學的血脈淵源，也賦予了其校本特色鮮明的身份密碼。文章進一步揭示了這八項價值如何通過分級主題的班主任課、獨特的「茶藝輔導」、朋輩計劃等校本培育架構，從理念細化為

日常行動，使古典智慧在現代校園中煥發出生生不息的實踐活力。

錢志安教授以學子和學者的雙重身份，回望在慈幼學校度過的十三載歲月，並深入闡釋其教育傳統。他從校名「慈幼」的經典出處談起，細緻解讀校訓「點燃火炬，照耀人群」的雙重意涵：既為個人求知修身指引方向，更旨在將光明與溫暖惠及他人。文章的核心在於詳盡解釋鮑思高神父以「宗教、理智、仁愛」為三大支柱的「預防教育法」，揭示了這一理念如何體現於對貧困青少年的切實關懷、以信任為基礎的師生關係，以及融合音樂與遊戲的愉悅教學實踐之中。他進一步指出，這一套融匯信仰、理性與關愛的教育哲學，不僅深深烙印在校歌「師生友愛，永無疆」的詞句中，更貫穿於學校八十餘載的辦學傳統，其對全人發展的強調以及對品德培育的重視，至今對現代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蔡思行博士以親歷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視角，圍繞母校屯門官立中學的「尊德問學」校訓，展開了一場貫穿學理、記憶與生命的深刻反思。他以活潑而溫情的筆觸，從千禧年前後執行校規的青春軼事談起，生動勾連起音樂課上數百次詠唱校歌的集體記憶，尤其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份關懷家國的期許感念至深。文章最終落腳於對校訓的深邃解讀，他將「尊德問學」溯源至《中庸》「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儒家傳統，並結合《論語》中「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智慧，闡釋了品德修養與知識追求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生命哲學。這不僅是對校訓的詮釋，更是一份關於如何成就君子人格、貫穿一生的成長告白。

區婉儀女士以金文泰中學百年校慶為契機，對母校校園文化進行了多層次的文化解碼。她將源自《論語》的校訓「文行忠信」，置於校徽的視覺設計、校歌的音樂旋律與學校近一個世紀的歷史演變中進行立體分析。文章細緻解讀了校徽中盾牌與木鐸的禮教寓意、「青出於藍」的色彩哲學，以及校歌「學海惟深，學山惟崇」如何將知識追求與道德修養譜入旋律的巧思。她闡釋了這三種載體如何從靜態符號、聽覺記憶到儀式實踐，構成一套多感官浸潤的傳承體系，讓學校精神在代代師生的日常中內化與活化。這項分析不

僅揭示了單一學校的文化肌理，更為理解香港百年教育如何創造性地將傳統智慧轉化為可視、可聽、可感的文化基石，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範例。

這些篇章，既有理性的分析與心靈的探究，更有感性的追憶與溫情的敘說。它們共同印證：校訓與校歌的力量，在於它們與鮮活的生命故事相結合。它們在晨會上的齊聲誦讀中，在音樂課上的反覆練唱中，在畢業禮上的莊嚴承諾中，甚至在畢業多年後某個瞬間的驀然回想中，完成了從抽象理念到情感認同、再到行為習慣的深刻內化。它們是學校饋贈給學子的一份獨特的文化行囊，陪伴他們從青蔥校園走向廣闊天地。

通覽這十二篇著述，我們可清晰看到香港學校校訓校歌文化「多元一體」的特色。其「多元」在於：它們或源於基督的博愛，或本於道家的自然，或承自儒家的倫理，或出自佛教的慈悲，或基於世俗的慈善信條，充分體現了香港社會開放、包容的辦學格局。其「一體」則在於：無論表述如何差異，其核心關切無不匯聚於「人的成全」——強調品格的磨礪、知識的追求、社會的責任與生命的完善。這正是中華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在香港這片現代土壤上的生動實踐。

希望下篇這些源自實踐、發乎真誠的分享，能讓讀者——無論是教育工作者、學生、家長，抑或是關心本地歷史文化的普羅市民——不僅了解香港各校的特色與故事，更能觸摸到那份透過校訓與校歌所傳遞的、穿越時間的教育溫度與文化力量。

願這些「青蔥印記」，能喚起您心中的共鳴，一同回味、思考並珍視那份屬於我們所有人的「年少如歌」。

謹此為下篇導讀。